

元代书籍刊刻初探

游嘉

(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)

摘要：在统治者的支持下，元代书籍刊刻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各路儒学和书院刻书的兴盛，其所刻书籍多为经史之书，校勘精良。坊刻书籍则相对式微，但种类丰富，通俗文学刊刻量相较于宋代有所增加。

关键词：元代；书籍刊刻

元朝统治者于马上得政权，但也逐渐认识到文治的重要。在“自太祖、太宗即知贵汉人，延儒生，讲求立国之道”的指导思想之下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办学校、保护工匠的措施。元代刻书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各路儒学和书院刻书的兴盛，坊刻书籍的发展则相对衰微。

一、儒学、书院刻书

元代统治者十分注意地方各级儒学的建立，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。据至元二十三年(1286年)大司农司的统计，“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，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石，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。”政府不仅予以粮食的支持还拨分学田以保证书院的运行。至元三十一年(1294)又令“其无学田去处，量拨荒闲田土，给赡生徒，所司常与存恤。”“诸赡学田土，学官职吏，或卖熟为荒，减额收租，或受财纵令豪右占佃，陷没兼并，及巧名冒支者，提调官究之……诸各处学校，为讲习作养之地，有司辄侵借其钱粮者，禁之。”元统治者考虑十分周全，以法律的形式充分保证儒学及书院的经费，这样它们就有足够的资金刊刻书籍。由于经费充足，基本不承担国家的印书任务，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各种书籍进行校勘，所以儒学及书院所刻之书也是最为精良、刻书最多的。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：“闻之宋元刻书，皆在书院。山长主之，通儒订之，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。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：山长无事而勤于校讎，一也；不惜费而精工，二也；板不贮官而易印行，三也。”

山长、通儒费时费力校订、供学者传习的书籍多为经史之书，如太平路儒学刻《汉书》，瑞州路儒学刻《隋书》，宁国路儒学刻《后汉书注》，建康路儒学刻《新唐书》《晋书》《新五代史》，池州路儒学刻《三国志》，无锡州学刻《白虎通德论》《风俗通义》，绍兴路儒学刻《吴越春秋音注》，集庆路儒学刻《乐府诗集》，福州路儒学刻《乐书》《礼书》，嘉兴路儒学刻《大戴礼记注》《诗外传》，西湖书院刻

《文献通考》，梅溪书院刻《韵府群玉》，广信书院刻《稼轩长短句》，宗文书院刻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《五代史记》，南山书院刻《广韵》，梅溪书院刻《韵府群玉》，雪穗书院刻《尔雅注》。儒学及书院的性质决定了其所刻之书的功能是有益于教化，传承知识，同时也为统治者的文化建构服务。

二、坊刻书籍

相对于儒学、书院刻书，坊刻就没那么繁荣了。南宋时尚有二百余家，这时可考者不过百余家。刻书重要者有大都、平阳、杭州、建宁四处，其中建宁书坊几占一半。

大都刻书有燕山窦桂芳活济堂，刊有医书《新刊黄帝明堂针灸经》《伤寒百证经络图》《针灸四书》附窦氏自著《针灸杂说》一卷。另有《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》《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》《楚昭王疏者下船》《公孙汗衫记》等元杂剧，不知大都何家书坊所刊。

平阳刻书有：平阳晦明轩张宅（即张存惠堂）刊《重修政和证类本草》和《经史证类大观本草》，平水中和轩王宅刊《新刊韵略溢水文集》，平水许宅刊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和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，平阳府梁宅刊《论语注疏解经》，平水曹氏进德斋刊《巾箱本尔雅郭注》和元好问的《翰苑英华中州集》《中州乐府》，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刊《河汾诸老诗集》，平水刘敏仲刊《尚书注疏》，平阳司马颐真堂刻《新刊御药院方》。

元代杭州书坊可考者不及南宋之多，有：杭州书棚南经坊沈二郎和杭州睦亲坊沈八郎都刻有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武林沈氏尚德堂刻《四书集注》，还有杭州勤德堂，刊刻书籍不可考。另有戏曲七种，均有“古杭新刊”字样，不知出于何家，分别是：关汉卿的《古杭新刊的本关大刀单刀赴会》、尚仲贤的《尉迟恭三夺槊》、王伯成的《风月紫云庭》和《李太白贬夜郎》、郑光祖的《辅成王周公摄政》以及《霍光鬼谏》《小张屠焚儿救母》各一卷。

建宁之书坊较之南宋略有增加,可考者有四十五家,刊刻书籍可考者如下:虞氏务本书堂刊有《东坡诗》《赵子昂诗集》等。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有《唐律疏议》《李杜诗》《国朝名臣事略》等十四种。余氏勤德堂刊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。余彦国励贤堂刻《本草》。翠岩精舍刻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陆宣公奏议》《玉篇》。刘氏日新堂刻《诗经》《春秋》《韵府群玉》《太平金镜策》《伯生诗续编》《揭曼硕诗》等十余种。郑氏宗文书堂刻《静修集》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等。建安陈氏余庆堂刻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等三种。吴氏德新书堂刊《四书章句图纂释》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《书集传》。麻沙万卷堂刻《孟子集注》。书市刘衡甫刻《联新事备诗学大成》。建安虞氏刻《三国志平话》和《新刊全相三分事略》(二者为同书异名)

另外还有1979年于西安发现的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》残页。

元代坊刻与南宋坊刻相比,书坊减少了一半,刻书类型经部12种、诗文集10种、史书7种,医书10种,子部2种,佛书1种,另外还有杂剧4种,戏曲7种,小说2种。刻书可考者远远少于南宋,但是通俗类读物从1种增至13种。据清钱大昕

《补元史艺文志》的统计,元代刻印的书籍,经部为804种、史部为477种、子部为763种、集部为1098种,共3142种。通俗类读物所占比例仍然很小。话本小说类只有两种,其余11种为舞台表演的戏曲杂剧。

在统治者的支持下,元代书籍刊刻中各路儒学和书院刻书兴盛,其所刻书籍多为经史之书,校勘精良。坊刻书籍则相对式微,种类丰富,仍以经、史、诗文集为主,通俗文学刊刻量相较于宋代有所增加。

参考文献:

[1](明)陈邦瞻.元史纪事本末·自序[Z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

[2](明)宋濂等.元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

[3](元)元典章:卷二[Z].北京: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1998.42

[4](清)顾炎武.日知录[M].湖北:湖北辞书出版社,2017

作者简介:游嘉(1988-),女(汉族),四川成都,武警警官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助教,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。